

论人地位的变化及其与语言学发展史的联系*

鞠玉梅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 310018)

提 要: 语言哲学的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 因此语言哲学家们提出各种不同的意义理论。本文首先梳理人在不同的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的地位, 随后回溯 20 世纪语言学发展范式的变化史。研究发现, 在不同的意义理论中, 人的地位截然不同, 经历从无到有再到强调的一个过程。人地位在语言哲学意义研究中的变化与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 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关键词: 语言哲学; 意义理论; 20 世纪语言学发展史; 联系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4)05-0013-5

On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Human Being in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Ju Yu-mei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The key theor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the theory of meaning. Philosophers of language have put forward various theories of meaning. This paper first attempts to review the role of the human being in the theories of meaning. And then it traces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he different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role of human being goes through a change from being nonexistent to being existent and then to being emphasized. And the change of the role of human being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paradigm shift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heories of meaning;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relation

1 引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开始关注对语言的研究, 产生了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研究的中心从认识论转向了语言, 哲学家通常把转向后的哲学称为语言哲学, 并将“语言看作是理解和解决哲学问题的主要手段”(Baghramian 1999: xxx)。语言哲学试图对语言做出最根本和最深刻的反思, 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对语言的分析, 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 其核心理论为意义理论, 认为“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是哲学研究的恰当起点”(Baghramian 1999: xxxii)。意义理论主要“研究语言符号为何具有意义, 依据于什么而具有意义, 什么是命题的经验意义的标准, 什么是意义的基

本单位, 意义是否具有确定性等问题。”(涂纪亮 2007: 437) 在意义问题上, 语言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意义理论, 有指称论、行为论、功用论、意向论、体验论和人本论等意义理论。在这些意义理论中, 人的地位截然不同, 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被强调的一个过程, 体现了不同的意义理论对于研究“语言——世界(存在)——人”三元关系的不同态度。如果我们回溯一下语言学的发展史, 会发现语言哲学意义研究中人的地位的变化是与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的。本文试图梳理人在不同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的地位, 探索其变化的轨迹, 并将其与 20 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 以探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英译研究——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西方修辞学视角”(13YJA740022)的阶段性成果。

的关系。

2 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人的地位

2.1 指称论

指称论是英美语言哲学家首先提出并具有广泛影响的意义理论。指称论认为一个表达式的意义等同于它所指称的东西或等同于它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弗雷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都是指称论的代表。弗雷格(2006)认为人们构造和使用任何语言,一定会有所指称,否则,说出的语言就只能是一些空洞的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声响,一个表达式有指称是语言有意义的标准。罗素(1982)认为专名和个体相对应,命题和事实相对应,专名——个体、命题——事实都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语言表达式必须和非语言的实在的东西即存在的东西相联系才有意义,我们所思考和谈论的任何对象都具有它的存在。前期维特根斯坦的意义图像论认为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命题与事态之间的关联,取决于命题是否是事态的图像,一个原初命题由于摹绘了一个原初事实而有意义,命题和世界的逻辑对应决定了命题和语言的意义。指称论的核心是追求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二元对应关系,忽略了“语言——世界——人”三元关系中的人的因素。追其根本,意义的指称论者所持有的是一种证实论的意义观。这种意义观的根本特性是只看到意义的实在性纬度,完全否定人的理解或意向对语言意义的创造和贡献。追根溯源,指称论时期对三元关系中的人的因素的忽视源于其用数学和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源于用数学和逻辑的方法分析、改造和重建语言,是由其研究方法和目的所导致的,许多语言哲学家同时又是做出重大贡献的数理逻辑学家,例如弗雷格和罗素等。他们所关注的不是日常普通语言,而是希望通过逻辑创造一种完美的理想语言。由此可见,指称论由于拘于“语言——世界”这个二元范围内,人的地位和作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符合当时科学界和哲学界追求精确知识的趋向。

2.2 行为论

行为论认为可通过公共地可观察的行为来说明语词的意义,主张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考察意义问题。行为论基于行为主义者的信念,即科学必须以可观察事物为对象,以可重复实验的方式进行研究。皮尔士、杜威和蒯因等是行为论的主要代表。皮尔士(2006)主张把意义、信念和行为联系起来考察,可以从对观念的信念以及由此建立

起来的一套习惯来考察语词的意义。他认为,为了获得一个概念的意义,“人们就这一概念的真理必然得出什么样的可以设想的实际效果,这些效果的总和将构成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一个事物的意义简单说来就是它所涉及的习惯”(涂纪亮 2007: 477),因此要确定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对其进行一系列操作实验的过程。杜威和蒯因通过“刺激——反应”来研究意义。杜威(2006)明确地把行为主义引入到他的实用主义学说中,强调要研究作为有机体的人的行为,研究人对环境所作的反应,人的行为就是经验,“刺激——反应”这个公式是研究作为有机体的人的经验应遵循的路线。蒯因也是从行为主义的立场论提出他的行为论观点,他瓦解了关于意义的“博物馆神话”,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具体来说,是人们在可以公开识别的场合下的活动(Quine 1960)。要寻求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就必须考察有关这些表达式的运用的公开条件,也就是考察运用语言的人们的外部行为。蒯因把“刺激反应”看成一个语句在一特定时刻的意义,因而提出了“刺激意义”这一重要概念。他与杜威一样,认为意义从根本上说是人的一种行为特性,而且是一种公开的公共可观察的行为倾向。在行为论中,人的作用表现为对环境刺激所作出的反应。人的因素开始得到关注,但并非是积极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在意义的构建中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2.3 功用论

功用论认为语词的意义在于语词的功用,意义存在于使用中。谈到语言的使用,就不能不涉及到语境,而语境总是要谈到说话者、听话者以及谈论的对象,这就要谈到人的因素。后期维特根斯坦是功用论的主要代表。指称论和图像论之所以会误入歧途,盖因他们远离了沸腾不息的生活之流,脱离了生机盎然的语言活动(尚志英 1992)。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生活形式”,并且认为语言或语言活动是最重要的生活形式,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生活形式。为此,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说,认为词和语句的意义在于其使用,我们需要研究词和语句的使用规则,即语言游戏的规则。意义的功用论始终把语词在特定语境中的功用置于首位,着重考虑人们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词与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用途,仅仅从词与语句本身无法掌握词的意义,我们必须从它们的使用中,从它们所使用的语境中,从它们被使用的

目的中,了解其意义。这样就把语词的意义同人的需要和人的意愿等语境因素联系起来,因为人的语言是由人来使用的,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终于成为语言哲学家讨论语词意义时不可回避的纬度,语言研究被纳入到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际关系中考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意义使用论将语言引向社会、引向生活、引向人,这已被看作是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主要贡献。它标志着语言意义研究由对“语言——世界”二元关系的探讨转向对“语言——世界——人”三元关系的探讨,打破了一一对应的直线静态关系,取而代之的是语言与运用的多元的动态关系,意义不再是语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理解一个语词的意义就是理解它在何种语境中发挥何种作用,语词的意义是由人在使用中所赋予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指人的心理过程给词语以意义,对一个词的意义理解不是一个说出或听见这个词时所发生的心理过程,词语只有在有关它的使用中才具有意义。维特根斯坦对于心理过程的否定,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这一因素的重视。原因在于,在功用论语言哲学家眼中,人的作用仅仅是一个语言的承载者,“‘人’并不以自己的特性影响语言,‘人’就像是方程式中的常量,离不开它但又不起作用,不是影响函数值的自变量”(姜胜 2001: 64)。

2.4 意向论

意向论认为语词的意义来源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义指的是意识的意向。意向论是从意识的意向性出发考察语言的意义的。胡塞尔、利科、格莱斯和塞尔是意向论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对意义和意向的关系作了充分的论述,强调意向性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意向赋予表达式以意义,表达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由于它明确地提出某种思想的意向。语词的意义来源于意识的意向性活动,“意义指的是意识的意向,对意向的观念性把握就是意义。”(涂纪亮 2007: 463)利科认为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话者意谓着什么,即他打算说些什么;二是语句意谓着什么,即语句的识别功能和断定功能的结合产生出什么(涂纪亮 2007: 467)。格莱斯认为一个说话者通过说出某句话意指某种东西,即说话者的意图在于使说出的话语通过听话者认识到这种企图在听话者身上产生某种效果,一旦讲话者成功地交流了他所意图表达的意义,他便完成了一件可收言后之果的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讲话者的意图,讲话者所意欲达到的目的,人的意向性活

动赋予了声音文字以意义。因此,格莱斯引入了“说话者意义”这一概念,并将其与“句子意义”分开。塞尔赞同格莱斯的说法,并将其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在塞尔看来,“意义不外是某些比较原始的意向性形式的特殊发展,因此完全可以借助于这些比较原始的意向性形式来给说话者所说的某个语句的意义下定义。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意向来给意义下定义,即用相信、希望、意图等心理概念来给意义等语义学概念下定义”(涂纪亮 2007: 617)。随着意向性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深入,这种观点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语言意义研究中“人”的地位大大提升,得到了重视和强调。

2.5 体验论

体验论认为语词的意义是人们对现实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结果,强调人的认知因素在意义产出中的重要作用,认为“语义是基于人类认知与概念结构的,与人的主观因素不可分离,是人们通过相互理解而达成的共识,具有主体间性”(王寅 2007: 272)。其核心观点是:意义来源于人的感知体验。莱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的意义理论以体验哲学为基础,大力强调人在意义构建中的作用,否定有绝对的客观真理,是对西方以往客观主义哲学观的一种颠覆。体验学派所分析的语言非理想语言和逻辑语言,而是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将后期维特根斯坦与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意义研究的“回归生活世界”、“关注日常语言”、“重视人的地位”之风气发扬光大,可以看作是对基于客观主义的哲学的意义理论的一场革命。语言学领域中的认知语义学和符号学领域中的认知符号学是这种体验论意义观的具体表现。莱柯夫和约翰逊认为客观主义哲学观不考虑人在认识范畴、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建构语义时的主观能动性,他们认为人们在对外部世界进行认知加工并形成语言的过程中必然会上人的因素,因此,人类的思想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过分依赖客观事实来确定意义是根本就不可能的。这反映了近年来语言哲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对人脑与语言的关系的研究。”(Baghramian 1999: xxxvii)

2.6 人本论

人本论的核心是“呼唤人因素的回归”(李洪儒 2006: 29),呼唤语言意义研究回归人的生活世界,认为语言和语义研究当贯彻人本精神,才能对其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将“人”置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的中心位置是其显著的特点。欧陆人本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是人本论的主要倡导者。胡

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哈贝马斯、德里达和福柯等人是本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关注人性和人的本质,比日常语言学派的意向论者和认知学派的体验论者更加增大对“人本”因素的张扬,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他们走向了客观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的主观主义。他们认为意义是多元的、不确定的,否定绝对真理,提倡“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定事物不存在确凿的、同一的、永恒的本质,它取决于人们的不同视角,受制于个人的主观因素,从而打破了关于唯一正确的“方法论”神话,否定认识事物的“单一视角”。文本无绝对意义。哲学的首要任务不在于提供可靠的基础或知识,语言与世界同构的图像论神话已被毁灭,意义变得游移不定,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对意义的阐释。与体验论相比较,人本论似乎过于的激进,完全走向了传统客观主义哲学观的对立面。

3 人的地位变化与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语言学界的革命是由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发的。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典型特征之一是二元思维模式,他提出来的一系列成对概念,比如“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纵聚合”和“横组合”、“内部”和“外部”等都是二元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这基于西方分析哲学根深蒂固的二元论,是在场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另一特征是将语言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强调语言系统中的各种成分以及各成分间的各种关系的重要性,即内在结构的重要性,将物理和社会的世界彻底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虽然,索绪尔语言观的核心是:语言是有规则、有系统的社会现象(social facts)。但索绪尔所说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语言具有社会功能,而是指一种“集体意识”,即语言系统同一切社会惯例一样,是一切成员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制度,是一套惯例的汇总。语言可以被视为一个自成结构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词语的差别和其间的关系。语言研究的明确目标是探讨语言系统内部的性质、规律、结构及意义等,即研究语言而非言语,因为在索绪尔看来,言语涉及诸多领域,与物理、生理、心理和个人习惯等都有关联,因此,将言语作为研究对象是难以得到什么规律的。由此,索绪尔将语言学研究对象进行了“净化”和“提纯”,这也经常被看作是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突出贡

献。但正因为此,索绪尔的语言研究就切断了语言与人和世界的联系,使语言成为一个封闭的、单独存在的符号系统,不考虑作为语言使用的主体的人对语言符号结构的驾驭,能指只与所指相对,与人的内在情感没有关联,语言是在一种共同无意识遵守的规范体系里获得自身的意义与价值。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的中心是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理论,所从事的仍旧是语言结构的形式研究,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是语言能力而非语言运用,这说明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具有同源性。他虽然提及了人、人的心智,但其根本宗旨是倡导句法自知,把研究范围限制在纯形式范围内,将人的主观因素甚至意义排除在其研究之外。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是客观主义哲学观的代表,与弗雷格、罗素、前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观一致,提倡二元论,无视意义生成的人的主体因素。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它继承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思想,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强调共时语言的重要性,认为语言研究要分析语言的内在结构。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学要研究可观察到的语言行为,语言的意义必须通过行为活动来解释,因为行为活动是可观察的、可实证的。因此,布龙菲尔德被看作是语言学领域行为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把语言理解为一些引发反应的刺激源以及对某些刺激的特定反应,语词意义是受语言刺激而产生的行为。他的刺激—反应模式($S > r \dots s > R$)说明可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来解释意义,使意义的解释进入了可实证的范围,强调了语言研究必须要有可观察性。布龙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意义解释模式,或者说“意义即刺激行为”的观点,是要抛弃带有异质因素的意义,把外部因素、个人因素、历时因素相关的意义问题抛弃,追求准确严谨,把意义变成“可观察”、“可实证”的问题,认为语言研究解决不了和人的心理、人的文化相关的意义问题。布龙菲尔德的语言意义观以及语言研究方法论与语言哲学中蒯因等的意义行为论有异曲同工之处。

以奥斯汀和塞尔等日常语言学派为代表,在语言学中开创了语用学研究,语用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是“语境”,语境的概念也经历了从仅指上下文语境到物理语境再到心理语境和认知语境的发展和变化,重视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重视人的意向和交际意图在语言意义构建中的作用。语

用学使语言学研究实现了由仅关注系统内部结构的关系到关注人与语言符号的关系的转变,语言使用的因素以及人的主观意图得到了重视,这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的功用论和意向论相一致。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主张从语言社会交际功能的角度来审视语言,“它旨在通过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应实现的功能来描写和解释各种语言的语义的、语法的和音系的语言学特征。”(胡壮麟 2000: 12)语言研究者不能将语言视为可以孤立地进行考察的符号系统。语言研究的重点是言语,而非语言。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准则就是重视对自然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人们在交际中实际使用的语言的研究,语言的使用表现为实现人们的各种交际功能,这要考虑到人在社会交际中的需求。功能语言学与语用学一样,体现出对人的因素的重视,特别是在社会语境中,语言所能实现的服务于人的交际目的的功能。语言的意义不单单指某个语词的意义,而是指所有语言单位作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所能实现的功能,这与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的功用论和意向论有相同的学术旨趣。

近年来成为国内外语言学研究热点的认知语言学是对以往的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一种超越,它“充分强调语言的体验性和人本性,以‘人化的语言’为旗帜,将语言研究融入到了后现代哲学的大潮之中。”(王寅 2009: 33)后现代哲学思潮中的语言研究要打破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消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二项对立被推翻,意义不再像结构主义想像的那么稳定,影响意义生成的要素不断变换,因为语言的意义是人的认知加工的结果,是“惟人参与”的结果,语言是人化的语言。其结果就是二元对立的彻底消解,多元意义上的语言意义观就理所当然地堂而皇之地登场了,因为人的认知和心理语境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蔓延之网,因此,语言的意义也就充满了流动和变化。认知语言学与体验论和人本论的哲学观一致,使人在意义构建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与20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期间我们很难说是语言哲学影响了语言学,还是语言学影响了语言哲学,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4 结束语

本文探讨了语言哲学意义理论中人的地位变化,可以看出,人的因素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被无限扬升的过程。通过对20世纪语言学发展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体会出语言哲学和语言学发展的密切联系,它们形成了互为影响的关系,可以将彼此看作是自己发展的营养钵。把握好“人”这一元素在语言哲学意义研究中的起伏变化,可为我们理解语言哲学提供一条线索,并有助于我们总结语言学思想史,这对于推动语言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胡壮麟. 功能主义纵横谈[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杜威. 杜威文选[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弗雷格. 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姜胜. 语言哲学中“人”(讲话者)的地位问题概览[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1(3).
- 李洪儒. 系词——人在语句中的存在家园[J]. 外语学刊, 2006(2).
- 罗素. 数理哲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皮尔士. 皮尔士文选[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尚志英. 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涂纪亮. 涂纪亮哲学论著选(第三卷)[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王寅. 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看语言象似性[J]. 外语学刊, 2009(6).
- Baghramian, M.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1999.
- 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Quine, W. V. O. *Word and Object*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收稿日期: 2013-06-30

【责任编辑 谢群】